



我国重大比赛备战动员机制的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Study on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Preparing for Major Competitions in China

石岩¹, 赵阳¹, 田麦久²
SHI Yan¹, ZHAO Yang¹, TIAN Mai-jiu²

摘要: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备战动员现象和经验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作为重大比赛备战工作的辅助性措施,备战动员可以有效地调动与整合国家竞技体育资源,促进备战和参赛工作的全面开展与持续深入;2)基于动员研究的认知基础和我国竞技体育备战的实践背景,备战动员可以借助会议动员、竞争动员与政治思想动员等方式,在领导机制、计划机制与法律机制等动员机制的整体协调作用下对体育人力资源、体育科技、后勤保障等要素进行有效动员;3)动员部署的阶段性和实施的有效性是决定备战动员具体操作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比赛;备战;动员;机制;竞技体育;中国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study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d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mobilization mechanism of preparing for major competitions (MMPMC)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As auxiliary measures of the preparations for major competitions, mobilization of preparations for competitions could mobilize and integrate national competition sport resource effectively; (2) Based on leadership mechanism, planned mechanism and legal mechanism, by dint of mobilization, competition mobi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MPMC mobilized sports human resourc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ogistic works with great efficiency; (3) Validity and periodicity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factors of MMPMC.

Key words: major competitions; preparation for competition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competitive sports; China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现代竞技体育赛事往往是立体竞争,实现竞技优胜的目标,特别是对于综合性比赛(奥运会、亚运会等)和单项世界比赛(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及系列大奖赛)等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而言,已不再是单一学科所能胜任的,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1]。为此,田麦久(2002)指出,构建指导运动员成功准备和参加比赛的竞技参赛理论体系,成为当代竞技体育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2]。

然而,将准备和参加重大比赛立足于运动训练的目标性准备,更多的是训练学层面的价值体现。除了必要的训练准备和事务性准备之外,备战重大体育赛事的另一层社会意义还在于对竞技体育资源动员的可能。世界各体育强国都将“竞技体育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科技、体制等资源及条件均能得到很好的保证与利用”^[3]视作是在世界大赛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失去了这种动员和募集竞技体育资源的动能,纵然是竞技体育强国也会“发挥失常”^[3,4]。近2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对竞技体育资源管理方面仍然表现为以利用为主^[5],间或还会发生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重现象^[6]。这都使得备战动员工作日渐成为竞技体育资

源过程化管理中一个选择性使用的环节或方面,这无异于是一种间接忽视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价值取向。

因此,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举国体制”模式和机制的背景下^[7,8],为了积极地适应我国竞技体育实力不断发展与提高的需要,更好地完成重大竞技体育比赛的任务,就必须独立地为其设计动员规划,进行有效的社会发动,为竞技体育备战与参赛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资源和条件的保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与总结我国竞技体育以往参赛准备过程中动员工作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教训,针对备战动

收稿日期:2007-06-11; 修订日期:2007-08-14

作者简介:石岩(1966-),男,山西汾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体育运动心理学与运动训练学研究, Tel: (0351) 7018237, E-mail: tyshiyang@163.com; 赵阳(1979-),男,山西汾阳人,助教,在读博士研究生; 田麦久(1940-),男,山东青岛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者单位:1.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2.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1.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员的构成要素、动员方式、运行机制与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有助于揭示新形势下我国竞技体育在重大比赛备战过程中动员的运作模式与一般规律。

1 备战动员的现实意义

1.1 备战动员的含义

在备战和参加重大比赛过程中的动员(简称“备战动员”)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及单项运动协会等为了有效准备和成功参加重大比赛,面向体制内外,针对不同动员对象采取紧急措施(物质刺激和思想激励)的过程。

严格地讲,备战动员的目的不在于资源的新增,而是旨在通过合理的动员机制不断整合与配置各种重要的竞技体育资源(人力及精神、科技、财力与物力等),实现其由平时训练状态到比赛状态、由潜力到实力、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化,创造良好的竞技体育物质文化平台发挥强大的精神动力优势,为重大体育比赛参赛准备的顺利实施及比赛任务的成功完成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因此,备战动员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整合国家竞技体育资源、调适备战和参赛的动员主体与行动主体的社会心理,使之能够积极主动参与重大比赛的备战工作,促进备战和参赛工作的全面开展与持续深入。

参赛准备与为其所做的动员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参赛准备是在参加比赛前预先进行的筹划与安排^[9]。从工作格局上讲,备战动员是参赛准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从属于“参赛准备”这一整体行动的社会发动过程,是其下位概念。不同的是,相对于参赛准备这一中心工作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而言,备战动员工作更多地表现出依赖性和开放性,它是参赛准备过程的外部表现之一。

1.2 备战动员的认知基础

动员(Mobilization)原是一个军事用语,最早见于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其范围来说,动员是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活动^[10]。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概念被普遍使用,并不断赋予新的涵义,泛指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随着社会运动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动员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1]，“就是一个虔诚的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或一小群积极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虔诚和投入的人们动员起来加入集体行动的”^[12]。此外,Alsen(Olson, 1965; 奥尔森, 1995)^[13,14]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及在此基础上由Ganson(1968)^[15]、Oberschall(1973)^[16]和Tilly(1978)^[17]等人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从社会运动的理性选择视角分析了包括国家在内的领导集体化运动的各级组织是如何动员起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赵鼎新, 2006)^[18]。

我国关于动员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动员^[19]、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集体化^[20]等社会运动动员方面,尤其是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21]等方面。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政治领域^[22]、经济领域^[23-25]、军事领域^[26-29]和社会学领域^[30,31]等多个领域中的动员问题展开了研究。

目前,鲜有对国家队准备和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动员的专题研究,但是,在一些研究和报告中仍然可以发现与之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分析与报道。这涉及备战工作、动员大会及其他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32]相关因素等方面。刘鹏(2005)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暨2005年冬训动员大会”上从坚持和发挥举国体制作用的角度提出“动员全国体育系统”为2008年奥运会的备战工作服务^[33];段世杰在2007年全国体育总局局长会议上将竞技体育备战工作视作是“目前体育系统面临的最重要、最紧急、最艰巨的任务”^[34];黄玉斌(2003)从高水平运动员激励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体操队运动员的精神动力^[35];肖林鹏(2003)从资源认识和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竞技体育资源的培育、开发、配置和利用的现状与对策^[36,37];黄文仁(2002)分析了社会动员对于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作用^[38]。

这些研究和报告从宏观决策层结合微观操作层以及从理论研究联系实践探索的角度,为进一步探索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3 备战动员的实践背景

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工作不但要以训练工作为中心和导向,更需要得到来自竞技体育自身各个层面的有力支撑。在现代竞技体育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中,只有通过集中与重新配置竞技体育资源,方能体现出我国竞技体育竞争力。

1.3.1 备战动员的宏观潜能

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18]。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国家行政机构高度集中权力,统一调动全国力量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管理体制的简称,其最大优势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33]。而这种为了实现既定的竞技体育目标,通过动员整合国内有限的竞技体育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吸引最广泛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到备战和参赛的行动中来的潜在能力,就是备战动员的宏观潜能。

200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国际综合赛事的备战与参赛过程。从备战悉尼奥运会到备战雅典奥运会,从备战亚运会到备战亚冬会,最后到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每次动员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因赛事的不同而程度不一的备战动员性质上,也体现在我国“举国体制”动员能力的高低上。备战动员工作的推进过程,既是“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资源的关系重构过程,也是“举国体制”竞技体育动员能力逐步提高的过程。动员潜能同我国“举国体制”与竞技

体育资源的关系重构处在一种相互彰显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资源关系的每一次重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资源动员能力,都是卓有成效的备战动员累加与演进的产物;另一方面,竞技体育资源动员能力的每一次提高,都为“举国体制”与竞技体育资源关系的进一步重构提供了可能。

可见,“举国体制”可以有效地持续动员竞技体育资源的需要和能力,为重大比赛备战过程中的动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宏观基础与保障。

1.3.2 备战动员的微观动机

竞技体育资源对于实现竞技体育目标起着重要的资源支撑作用^[36]。但是,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十分强盛,有限的竞技体育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对重大比赛参赛目标的实现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然而,人类活动的动力在其活动的内部,也就是主体不断增长的需要与客体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39]。这意味着,备战行为主体(运动员、教练员、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等)会通过对于重大比赛的备战和参加过程中竞技体育资源“成本-收益”的权衡而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性行动。

具体而言,在备战和参加比赛过程中,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和后进项目对这种“成本-收益”的权衡是不一样的。对后进项目来说,其备战重大比赛的行动动力不仅来源于国家对“奥运争光计划”的优势及未来前景的强调,显然也来源于一般的集体行动参与者所具有的“搭便车”动机——对他人的努力采取“搭便车”的策略^[14]。这可以使个人和运动项目自身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对竞技体育资源的同等享受,或者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竞技体育资源投入,借此获得某种“后发优势”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可能。对于潜优势项目和优势项目来说,绝对的优势和必胜的把握在激烈的国际比赛中日益成为稀缺资源。资源的有限性会导致备战和参赛过程中机会成本的大量存在,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极有可能会造成失去资源“配置优势和比较优势”^[40]的潜在风险,减弱或丧失已经获得的竞争优势。所以,潜优势项目和优势项目的“成本-收益”权衡不仅表现为理性地看待已有资源,还表现为在广泛的竞技体育资源领域内积极地调动社会深层次的优势资源,不断地使之转化为竞技体育资产,并最终内化为稳定的竞技体育资本。

可见,无论是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还是后进项目,对于备战重大比赛的价值判断都表现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有限理性”特征,即竞技体育资源有限性是激发备战和参赛主体实施积极备战与参赛行为的微观动机基础。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竞技体育要实现“巩固和加强在夏季奥运会的前列地位,在国际体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的目标,就需要以“个体的非理性状态”为代价来达成集体理性。这意味着在使“个体”以非理性状态实现“集体理性”的过程中,必须存在一个强大的外力进行发动和引导,这也是备战动员的导向价值所在。

2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要素分析

现代竞技体育更多地表现为“系统对系统”^[41]的较量。一次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工作需要涉及影响“综合制胜力”的各方面因素,这比参加比赛本身所辐射的对象及其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因此,有必要对备战过程中的人力资源、体育科学技术、后勤保障等要素加以区别,施以不同的动员行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动员措施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同时,也有助于将动员水平由单一强调“有效动员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积极备战”,向围绕主体、强调整体性动员和系统性动员的方向发展。

2.1 体育人力资源动员

体育人力资源动员,是一个国家为了适应重大比赛的需要,扩充和调整运动队及其他参赛组织所进行的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社会、参赛团体和参赛个人价值观和期望的改变,使之具备准备和参加竞技体育重大比赛的心理基础、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过程。从体育人力资源系统的结构来看,完整的人力资源动员应包括对体育系统内部、边缘及外部的整体动员(图1)。其中,体育系统内部人力资源的动员,即对备战动员主体和备战行为主体的动员是整个人力资源动员乃至整个备战动员范畴的核心内容。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备战和参赛的效果,同时,也决定着备战动员其他各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与有效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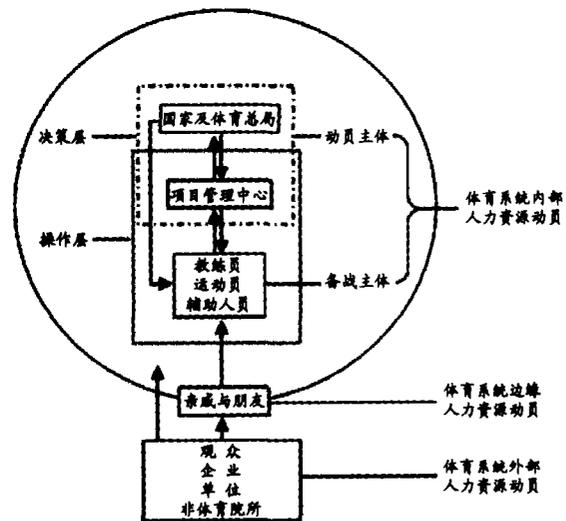


图1 备战重大比赛的人力资源动员结构示意图

2.1.1 备战动员主体

备战动员主体即备战重大比赛过程中负责动员组织、实施与调控的组织或个人,是将备战动员意图与规划直接而有力地转化为动员行动初始动量的群体。

在我国以往的备战动员工作中,扮演动员主体角色的组织或个人主要有两类:1)体育系统决策层或体育系统之外的某个主体,包括最高级别首长(如国家领导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等;2)运动项目内部更小的组成单元,包括党支部、某个教练员精英(总教练或主教练)及其群体。可以发现这些备战动员主体,无论是决策层面的动员主体还是操作层面的动员主体(图1),都是具备某些积极属性的“精英”,即是“异质性人力资

本的拥有者和社会资本的拥有者”,或者是“财产、权威、能力以及非正式影响力等稀缺资源”^[21]的拥有者。这说明,动员主体的素质对于备战及其动员行动的形成至关重要,这可能是决定着备战动员主体和备战行为主体关系的水平及其发挥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使备战动员工作更加富有成效,应该选择决策层或操作层内高素质的“精英”作为动员主体。只有借助他们拥有的比常人更高的专业技能、声誉与信誉,以及更强大的话语权、更广泛的社会资本网络,才能在备战动员过程中实施比常人更强的影响力、号召力和组织动员能力。

2.1.2 备战行为主体

备战行为主体是重大比赛备战任务的具体执行者。作为体育人力资源范畴内的备战动员客体,他们是备战动员主体为了实现备战动员决策(参赛目标与备战目标的动员观体现)所需要激发和引导的主要对象。

从我国历届奥运会体育代表团人员构成(表 1)来看,运动员人数占整个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二,代表团团部和各队官员(包括教练员、医生、翻译与陪练等)人数占三分之一。尽管这种人员结构不能直接对应备战过程中人员构成的真实情况,但是,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运动员、教练员、队医、科研人员等群体扮演了备战行为主体的角色。

表 1 历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情况一览表

届次	代表团人数	运动员人数	官员人数
1932 年 第 10 届洛杉矶奥运会	3	1	2
1936 年 第 11 届柏林奥运会	106	69	37
1948 年 第 14 届伦敦奥运会	53	33	20
1952 年 第 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	40	26	14
1984 年 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	353	225	128
1988 年 第 24 届汉城奥运会	443	299	144
1992 年 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	381	251	130
1996 年 第 26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495	309	186
2000 年 第 27 届悉尼奥运会	488	311	177
2004 年 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	633	407	226

资料来源:中国体育报、体总网(<http://www.sport.org.cn>)、华奥星空(<http://www.sports.cn>)。

不同的是,备战行为主体的不同群体往往需要施以不同特征的动员行动,其中,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动员工作尤为重要。

2.1.2.1 教练员动员的整体性特征

从第 28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结构(表 2、表 3)可以发现,现代高水平竞技运动对教练员组织功能的要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细化与多元化”^[42]的发展趋势。这使得现在乃至未来国家队教练员的动员行动中,不能局限于对“松散型”和“全能型”教练员进行局部动员的范式。还需要在对“操作层教练员”(技术教练、战术教练、体能教练、心理教练等专项教练员)动员的同时,兼顾对“决策层教练员”的动员。通过这种对教练员整体的动员,

可以有力地实现运动项目宏观发展的动员力度、广度和深度,使各层面的教练员都能积极关注并主动参与制定项目发展战略、监督与检查教练员工作,把握项目规律与发展动态,引领科技创新活动,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等工作。

表 2 第 28 届雅典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构成一览表(人)

运动员	领队	教练员	翻译	团部	医务组	合计
407	27	115	27	31	26	633

资料来源:体总网(<http://www.sport.org.cn/newscenter/shijian/2004-07-26/253799.html>)。

表 3 第 28 届雅典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外籍教练员统计一览表(人)

	教练员姓名	国籍	n
射箭	杨昌勤	韩国	1
皮划艇	马克	加拿大	1
女子手球	郑亨铎	韩国	1
女子的棍球	金昶伯	韩国	1
游泳	麦克唐纳(女)	美国	1
篮球	哈里斯	美国	1
	尤纳斯	立陶宛	1

此外,在形式必要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适当增加中、外优秀教练员进行项目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会,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教练员群体整体动员的有效方法。

2.1.2.2 运动员动员的差异性特征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运动成绩及水平的惟一承担和实现者,对其进行发动是对备战行为主体动员的核心体现。但是,运动员队伍却不是一个内部高度一致的群体,而是一个由具有不同水平和层次技能的人才组成的特异性专业群体。在备战过程中(尤其是在备战初期),运动员群体往往会包括主力运动员(或金牌运动员或一线运动员)、“老将”、“黑马”、二线和三线的后备人才、“陪练”等多个层面的运动员,他们在完成备战任务、实现竞技目标过程中需要使用不同的积极属性。可见,对每个运动员进行的备战动员工作,都将是一个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建构性识别”^[43]的过程。

具体而言,可以从控制训练目标、设计训练过程、实施训练绩效评估与反馈、修正错误行为等^[44]多个训练视角对不同运动员实施不同侧重点的心理激励;也可以在备战任务的具体目标引导下,从内部动力(需要、动机)和外部压力(行为示范、竞争)相结合的角度出发^[45],加大对运动员高层次需要(自尊、责任感和成就感)的激励与满足,以达到发挥运动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动目的。

2.2 体育科技的动员

体育科技工作日益成为各体育强国在重大比赛中获取佳绩的支撑与保障要素^[3,4,46]。在重大比赛的备战过程中,国家、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运动协会都会对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科技装备、科技信息与资料及其成果等体育科技资源进行统一组织和调整。通过对体育科技的动



员工作,达到保障备战需要、争取比赛的优势、提高训练质量和参赛水平的动员目的。

在奥运会等重大比赛的备战过程中,我国一向高度重视体育科技的动员工作^[47,48]。国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发动各种力量来为运动训练一线提供科技攻关与服务,并且支持力度与日俱增(表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对高水平运动员实施训练监控;从1990年起实施备战奥运会、亚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体系;备战27届奥运会奥运会期间,在重新组织了医疗资源和医疗科研技术力量的同时,还动员了有关人力和物力开展体育信息的服务工作,对“悉尼奥运会信息研究与服务”进行综合攻关,以多种形式为代表团提供了及时、准确、全面的奥运信息服务^[49]。这些竞技体育科技的动员工作,不仅提高了科学训练的水平,还在帮助运动员和教练员科学参赛、取得优异成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表4 我国近两届备战奥运会周期的体育科技动员程度一览表

	1997—2000年	2001—2004年	增加幅度(%)
经费(万元)	1 200	4 800	300
直接参与人次	约 890	约 1 470	65
攻关课题数量(项)	93	147	58

数据来源:袁伟民,2001a^[50],2001b^[51];史康成,2005^[52]。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竞技体育科技不可否认地长期存在一些体制性问题^[36],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诸如科技备战工作以及资金的投入时间晚,投入额度低与使用效率低的“双低”问题^[53],竞技体育科技贡献率不高^[54]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影响其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与支撑作用。为了更加科学地动员和组织重大比赛备战过程中的体育科技工作,需要对体育科技实施具有开放性的动员工作。这不仅要求对体育系统内部的科技力量进行有效动员,还需要将国内、外一切可以为之所用的科技资源进行综合动员。在备战悉尼奥运会的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就成功地动员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54个体育领域之外的科研单位和机构,针对57项重点课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技攻关与服务。这表明,未来的体育科技动员也必将是体育体制内外协同作战、国内与国外强强联手、共同提高科学训练水平的动员过程。

2.3 后勤保障的动员

后勤保障动员是指要充分调动国家、集体和社会的经济力量,保障比赛的物质与经费需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重大比赛备战过程中物质与经费的支持。

目前,我国在备战重大比赛过程中对所需经费和器材设备的募集,已由以往全部由国家提供,逐步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参赛集体自筹一部分,同时争取社会各界赞助来补充一少部分的“三位一体”的形式。通过社会力量的介入,不仅为社会力量带来一定的回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尽管如此,在备战悉尼奥运会期间,为了满足备战的需要,国家还是调用了多达

5.47亿元用于新建、维修体育场(馆),改善训练设施,购置专项器材,提供训练比赛经费^[48]。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竞技体育是一个“由庞大的群落系统参与的社会行为”^[9],其集群属性决定了在备战重大比赛过程中需要开拓更多的补给渠道,以便动员那些超越竞技体育资源的社会力量来促进与保障运动项目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这种社会力量必须是那些与竞技体育“有相似需求的其他行动者”^[55],可以是发行体育彩票的收益提成、体育产业的创收以及社会各界的赞助等,也可以是民众、文艺界与新闻媒体等方面对参加重大比赛的理解和支持。通过有效激发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支持体育系统备战重大比赛,实现对竞技体育体制内外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实施整体性动员。真正实现“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备战奥运之责任”^[33]。

3 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方式

动员的策略基础在于通过动员主体(领导)将备战和参加比赛的目的和目标清晰地传达给动员对象(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教练员、运动员等),以使之达成“动员支持”^[56],转化为有效的备战行动与训练成果,即思想上接受,行为上也接受,是一种对动员政策的主动性支持。因此,动员主体对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的动员方式也要基于为之所认同的观念和文化,对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以利于提高备战动员的有效性。

3.1 会议动员

集训动员大会或赛前动员会是我国竞技体育在重大比赛的备战过程中使用最多的动员方式与途径。以会议形式实施的动员行动主要是以各级组织的层层传达、层层动员作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主要渠道,以政策、观念、价值取向作为动员信息的主要内容,并在促成决策层承诺、相关部门知晓和参与、大众传媒关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动员的目的及其实施时间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训练动员大会(冬训、夏训、集训)与参赛动员大会(总动员、再动员)。虽然每次动员大会的内容会因参加和准备比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动员内容与特征:1)旨在使大家全方位地进入临战状态;2)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将国家、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单项运动协会的动员意图传达或部署给下一级部门、教练员或运动员等,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制度化特点;3)动员大会的内容一般涉及参赛形势与意义分析、参赛目标与任务强化、备战形势介绍(成功经验、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思想政治工作与情绪调动等;4)参加综合性国际比赛总动员大会中较少涉及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在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动员大会中有时会对集训或参赛提出具体要求;5)动员的效果则取决于有关部门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的能力,而非直接取决于动员大会。

可见,会议动员是一种紧密依托于政治与行政组织而

进行的,注重时效性、带有强制性的组织性动员,其意义在于“活化”备战行为主体对备战行为的认知与认同。在备战重大比赛的关键时刻(如集训前、比赛前),动员大会是实现对备战和参赛行为主体进行整体动员的有效途径,它将长期伴随我国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工作。

3.2 竞争动员

竞争动员就是根据一定的规范,利用一定的激励竞争机制,引导运动员或教练员主动参与备战重大比赛的行为过程。区别于精神激励和物质刺激,竞争式动员中的激励是以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的方式来促进备战行为主体间“博弈链”的延长。即如果不参加备战的具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失去已拥有的竞技体育资源与社会地位,反之,则可以通过参与竞争实现共同提高竞技水平,减少在运动队中被边缘化的不确定性。

在以往备战重大比赛的前期,常常会进行一系列的资格赛、选拔赛、积分排名赛,以确保参赛名额和人选,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竞争动员。近年来,还出现了媒体宣传和竞争动员相结合的新竞争动员方式。国家乒乓球队在备战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第4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过程中,将队内选拔赛和媒体宣传有机结合起来,以“直通车”的形式将权威媒体引入选拔赛的全部过程。相对于动员大会式的组织动员方式,“直通车”式的竞争动员则是以社会化的方式实现的,其策划和宣传更接近于企业活动与市场行为。这不但给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辅助人员以大赛前紧迫的感性认识,在兼顾锻炼队伍与选拔人才同时,还很好地愉悦了大众,提高了运动项目赛事的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力量的动员奠定基础。

尽管“直通车”式的选拔机制并非是一种完善的竞争动员方式,但是,这种新的竞争动员形式仍然具有积极的强化作用与意义。一方面,重大比赛的备战过程越来越“赋有公共事件的属性”,媒体对备战和比赛过程的报道会大大增强备战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情感投入;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动员可以间接增加备战主体之间的横向交流、交往与竞争等互动机会,这有助于运动员强化对重大比赛竞争性的“认知需求与团体认同”,即增强其思想和行为方面的竞争性。因此,较之会议动员,竞争动员是一种更深入、更持久的信息沟通活动。只要合理策划和充分运用这种动员方式,势必会收到仅靠会议动员无法取得的动员效果。

3.3 政治思想动员

现阶段,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等备战主体的动员更多地依赖实际的“物质利益引导机制”^[57,58]。但是,这并非表明可以忽略培育共同的精神认同和价值认同。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始终将广大运动员、教练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摆在备战工作的重要位置,将进行“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共同视为完成参赛任务的制胜法宝,并将展示体育道德风尚与提高竞技成绩的“双丰收”作为比赛任务和目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治思想动员中还蕴含了浓重的“强制性的军事化色彩”。这反映出,以

政治思想教育形式开展的动员活动是影响其他动员效果乃至比赛结果的重要环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政治思想动员也要与时俱进。既要体现体育的政治功能,提高其对爱国主义、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又不能抹煞和扭曲个性,尽可能地将运动员的思想和动机纳入到重大比赛的准备过程当中,让运动员把所有的力量用于备战过程。由于备战行为主体(运动员、教练员等)对参赛动员的认知并不一定在于了解动员过程的实质内容及其组织实施者的性质,而可能是一些颇具轰动效应的活动,所以,可以考虑利用象征备战动员的形象、符号与文化构建等认知获得方式来实现对备战主体的思想动员。其目的不在于激发备战主体的个体欲求,而是旨在强调积极的心理准备和良好的心理状态、唤起爱国情感,激发个人责任感,是一个“生产崇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以大规模的“活动”作为开展备战动员的基本方式。

政治思想动员是一项注重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活动,旨在将外在的影响逐渐转化为备战行为主体内在的自觉行动,使之更持久、更自觉,最终实现动员主体与备战行为主体的共同的“上下同欲者胜”。

4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运行机制

无论采用何种动员方式对何种要素进行动员,其本质都是对备战行为主体实施价值观和期望值改变的形式与途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达成,则需以建立健全备战动员的运行机制为前提和保障,在适当的激励与制约下得以规范化和规定化的完成。

机制(Mechanism)原是“用来制造某事物的工具或者事物产生的物理过程或精神过程”,也指“为达到一目的而采取的习惯行动”。从系统论分析,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59];从因果观分析,机制则可引申为两个事物间的可能存在的“经常发生的、易于辨识的因果关系”^[21]。基于此,备战动员的运行机制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竞技比赛预期目标的实现与备战动员行动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图2)。其目的在于针对备战行为主体的有限的理性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构造明确的行为模式、形成确定的制度约束,最大程度地消减其备战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提高备战行为主体行为选择的可预期性。作为一种为备战重大比赛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规则或模式,备战动员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一种和平的体育竞争或行政管理,更是在备战“大仗”和“硬仗”的紧迫形势下,充分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的具体所在。这主要通过领导机制、法规机制和计划机制等3个相互作用的体系组成横向流程组织结构来实现。

4.1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领导机制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领导机制是指国家、地方体育主

管部门或运动协会为实施高效顺畅的备战动员工作而建立的组织协调系统,旨在通过动员决策机构和动员执行机构的共同作用实现对重大比赛动员工作的整合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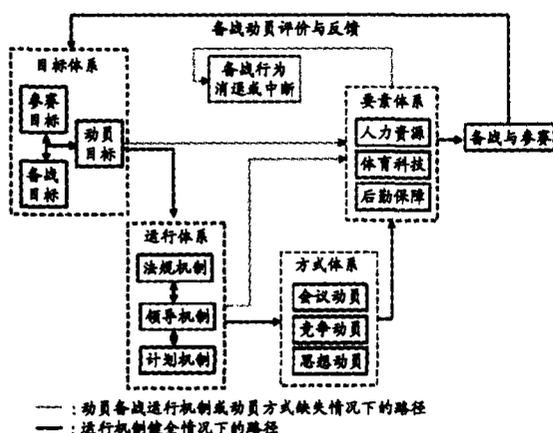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运行机制示意图

动员决策机构是国家、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运动协会进行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统率机构,是动员运行机制的“中枢”。国家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决策机构应该在《体育法》中加以规定,通常是国家体育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当国家面临参加重大比赛任务时,正确认识国际体育发展动向,科学分析国家竞技体育实力及其他国家的情况,及时判明即将参加的重大比赛的形势,迅速果断地采取比赛动员措施,适时宣布进入准备比赛状态,安排领导人发表动员讲话;根据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参赛准备的规划和计划,制定备战动员方案,包括与参赛相关的各方面因素的动员方案;总揽全局,协调备战动员系统与国家各行各业的关系,协调备战动员内部各大系统之间的关系;监督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准备工作 and 动员实施目标的落实;做好备战动员立法工作,用国家政策法规保证各项动员和动员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备战动员的执行机构指具体落实重大比赛备战动员任务的机关和单位。其主要职能是:1)对重大比赛动员工作实施具体筹划与管理;2)解决动员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协调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动员行动等。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执行机构主要是各级政府体育部门或运动协会设立的专门动员机构。在我国,为了备战重大比赛,国家或地方通常成立专门的综合性的领导机构,如奥运会办公室、亚运会办公室等;具体到各个运动项目,也会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项目备战重大比赛的有关事宜。

因此,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设置是否合理,动员方案是否完备,动员措施是否得力,直接影响着其引导与指挥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导致对备战工作的效果与比赛成绩的领导效力。

4.2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法规机制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过程中,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协调统一的现实中介是法规机制。它是指在国家制定、认可并强制保证实施的前提下,用法律与规范调整重大比赛备战动员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强势的保障系统。从外延

上看,备战动员的法规机制既包括正式规章或隐性规范,也包括这些法规赖以运行的组织机构与设施等。其中,以制度形式存在的法规是其功能体现的实质核心。从内容上看,这些法规可涉及备战动员的方针、制度和政策、机构、任务、实施程序与措施、目标、时限等有关备战动员的所有领域。从功能和目的来看,法规机制的直接功能就在于“通过技术的和价值的的手段”使备战行为活动的时空属性得以情景性的确定,从而达到备战过程的秩序状态。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命令进行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工作,但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有意愿加快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健全备战动员的法规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备战动员的内容范围、备战动员准备的措施,明晰国家决策机关与执行机构的备战动员职能和权限等,真正使备战动员走上专门化的道路。同时,国家、地方或运动协会参与制定与完善相应法规条例,也能有力地促进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更好地规范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程序与行为,克服备战动员的主观随意性,使备战动员工作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满足备战重大比赛的动员需要,确保重大比赛备战工作顺利进行。

4.3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计划机制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计划机制是国家、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运动协会为备战动员得以顺利实施而建立的能够预先制定计划与方案的组织定向体系,旨在明确备战动员的目标和依据,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把动员潜力转化为动员实力的方式和程序。它是重大比赛备战动员准备与动员实施的直接依据,也是组织和领导备战工作过程中“举国智慧”的重要表现手段。主要包括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具体任务、程序、时限、范围和要求,以及完成备战动员所采取的措施等。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计划通常分为综合计划和专项计划。综合动员计划又分为长期动员计划、中期动员计划和短期动员计划等。根据各种综合动员计划,还应制定相应的专项动员计划,如体育科学技术动员计划或国家排球队动员计划等。

要制定周密的备战动员计划,应该依据国家或地方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计划,预测重大比赛的需求;做好备战重大比赛可用资源的调查,对人力、物力、财力与科技等各种资源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比赛潜力进行深入调查;确定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范围和动员量;编制重大比赛动员计划草案,并通过专家审查和模拟实战等方式进行检验。

5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部署与实施

5.1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部署

重大比赛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确定下来,除了不可抗拒的原因外,原则上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参赛的国家或地方可以据此把握时机确定备战动员的时间和内容等。

根据备战和比赛不同的阶段,备战动员的实施一般选择在训练准备期、重大比赛出发前和临赛前等时机开展,并且呈现出动员时间越来越早和多个赛事连续动员的趋势。从我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实例来看,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以后就开始准备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比赛,并在 1998 年曼谷亚运会以后就开始进行备战悉尼奥运会的冬训、夏训的动员工作,直至开赛前 53 天时进行了最后的动员。到达悉尼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及其各运动队适时召开不同层次、不同人员参加的赛前动员会,有关领导为运动员加油鼓劲,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赛要求。与此同时,备战动员活动的地点和级别也在发生变化,从体育系

统礼堂到人民大会堂,再到比赛地;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参加到体育总局领导参加并讲话,再到临赛前领队和教练的最后叮嘱;从训练准备期的动员到临赛前的最后动员,可以说动员贯穿于运动训练与比赛的整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较长的训练期前举行体育系统内部的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备战重大比赛的一大特色,并已渐成传统。

可见,重大比赛的备战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动员部署时,需要在时间纵向维度上体现出相应的针对性和侧重点(表 5),充分把握和体现宏观动员与微观动员的和谐关系。

表 5 我国重大比赛备战动员工作的纵向部署一览表

主要工作	动员方式	目的与意义	
动员策划期	1. 制定备战动员的计划纲要;2. 争取国家各主要负责部门及其领导的认同与支持;3. 建立专家智囊团;4. 设立备战动员办公室。	会议动员 思想政治动员	由备战动员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备战动员的工作内容框架与策略,并对专家群体和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动员。
动员推出期	1. 传达与宣传备战计划和实施方案;2. 争取省市级相关部门、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及各领导的重视和支持;3. 成立省市级或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直属的备战动员执行机构;4. 举办备战或集训动员大会。	会议动员 思想政治动员	由备战动员的决策机构对执行机构进行动员,执行机构对下属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动员。
动员跟进期	1. 出台备战动员的保障制度与政策;2. 具体化的备战动员方案(对象、方式、目标)与实施步骤;3. 对教练员、运动员实施动员;4. 对体育科技实施动员;5. 对后勤保障及有关社会力量实施动员;6. 安排系列热身赛、选拔赛等;7. 备战生态环境的营造(传媒等)。	会议动员 竞争动员 思想政治动员	备战动员的核心阶段。由备战动员的决策机构及各级执行机构对备战行为主体及各相关要素进行发动,各项备战运行机制开始发挥功效。
动员评估期	1. 制定评估指标与方法;2. 实施评估,总结经验与教训;3. 反馈与纠错,完善备战动员结构与内容。	会议动员 思想政治动员	及时、全面、客观地评价备战动员工作绩效,依据动员目标和备战实际需要,改进动员工作。

5.2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实施

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实施过程,是依据国家或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发布的动员令和动员计划而组织实施的对比赛潜力进行发掘、组织和使用的过程,其实质在于将比赛潜力转化为比赛实力。这就需要备战动员的实施过程在总体上与备战过程同步进行,及时、有序、适度、全面地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其具体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

1. 国家、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运动协会依据重大比赛的赛事要求,发布比赛备战动员通知或条例,宣布进入重大比赛备战状态,实行必要的训练管制,建立健全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领导指挥机构,实施各项重大比赛动员计划,落实各项备战动员的具体措施。

2. 选拔并组建参赛运动队,进行强化训练,以提高比赛的竞争实力。这是重大比赛备战动员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3. 统一组织科研部门、科研人员,利用科研设施和科研成果,开拓新的体育科研领域,加速研制新式训练与比赛设备,以提高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促进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

4. 通过新闻发布会或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向社会发布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信息,寻求国内、外企业和商家的大力赞助。

5. 与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合作,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文艺等宣传工具,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爱国热情,支持运动员参赛,为夺取比赛胜利贡献力量。

6. 争取政府部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支持。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离不开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的介入与帮助。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重大比赛备战动员的根本。

此外,为了衡量和保证上述工作实施的有效性,还需要对当前和未来阻碍实现备战动员预期目标的障碍进行识别和考察,并设计和开发出更加优化、灵活和高效方法,真正及时、有序、适度、全面地促进备战动员工作的实施。这种对备战动员进行绩效评估、反馈和改进的程序化技术的实质在于,采用“过程、绩效和因果分析”^[60]来评价备战动员中问题的根源或机遇未被把握的原因,保证备战动员主体和备战行为主体能够透过备战动员过程的现象去识别其内在的绩效问题。因而,备战动员的评估和反馈过程是一个融合了“结果驱动型和效率导向型”^[61]的系统过程,这对于具有明确目的和目标的备战动员过程来说可以起到重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

6 小结

1. 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是国家(或地方)体育主管部

门及单项运动协会等通过合理的动员机制对竞技体育资源与要素进行的整合与配置,具有辅助备战工作开展与深入的效用。我国目前开展备战动员研究,既有坚实的理论研究支撑,又有较好的实践背景需要。

2. 开展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工作,需要区别对待体育人力资源、体育科学技术、后勤保障等动员要素,以便实现围绕主体、强调整体性动员和系统性动员的方向发展。

3. 为了提高备战动员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可以综合采用会议动员、竞争动员和政治思想动员等多种动员方式。

4. 基于备战动员的因果关系,应当建立起动员的领导机制、法规机制和计划机制等动员机制,真正从引导、规范和系统3个方面入手来达成备战动员目的。

5. 竞技体育备战始动时间的提前及各项赛事备战之间的延续性,使得重大比赛的备战动员必须体现出纵向部署的阶段性差异,并力求从“及时、有序、适度、全面”等方面提高动员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石岩. 我国备战与征战奥运会中有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4, 19(3): 26-30.
- [2] 田麦久. 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与学科建设[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2.
- [3] 肖林鹏, 赵云宏. 第27届奥运会前8名国家竞技体育成功经验及失利教训分析[J]. 中国体育科技, 2003, 39(7): 12-14, 17.
- [4] 叶杨. 俄罗斯奥运备战体制的变化及对我们的启示[J]. 体育科学, 2005, 25(12): 69-71.
- [5] 肖林鹏. 中国竞技体育资源纵管理实施对策初探[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0(2): 10-12.
- [6] 鲍明晓. 竞技体育在两种经济体制下运行特点分析[J]. 体育科学, 1998, 18(1): 6-10.
- [7] 杨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28(1): 1-7.
- [8] 鲍明晓. 关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思考[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1, 16(4): 48-51.
- [9]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18, 426.
- [10]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684.
- [11] 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 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A]. 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克·缪勒.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93.
- [12] 帕米拉·E·奥立佛, 吉拉尔德·马维尔. 集体行动的动员技术[A]. 艾尔东·莫里斯, 卡洛尔·麦克拉克·缪勒.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87.
- [13]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14] 曼库·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GAMSON, WILLIAM. Power and discontent[M].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8.
- [16] 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M].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3.
- [17]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M].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3.
- [18]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9] 毛克明. 社会动员, 政权实现, 组织建设[J].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45(3): 14-17.
- [20] 邓万村. 动员、市场风险与农民行为[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21] 刘俊浩. 农村社区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动员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20.
- [22] 关海庭. 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3] 王立新. 国民经济动员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24] 曾立. 国民经济动员力量量化与优化[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3.
- [25] 陈德第. 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框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 44-48.
- [26] 刘鸿基. 战争动员学[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2.
- [27] 陈廷民, 李晓. 发达国家战争动员制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 [28] 吴子勇. 战争动员学教程[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 [29] 张羽. 战争动员发展史[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 [30] 郑永廷. 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 40(2): 21-27.
- [31] 孔昭君. 抗击“非典”中的动员机制[J].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 3-5.
- [32] MCADAN DOUG,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3] 刘鹏. 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暨2005年冬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R]. 2005-11-22.
- [34] 段世杰. 2007年全国体育总局局长会议讲话[EB/OL]. <http://www.sports.cn/2007-01-19>.
- [35] 黄玉斌. 体操新概念: 高水平运动员训练行为控制规律研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 124-181.
- [36] 肖林鹏. 中国竞技体育资源调控与可持续发展[D].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37] 肖林鹏. 中国竞技体育资源纵管理实施对策初探[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0(2): 10-12.
- [38] 黄文仁. 社会体育发展与社会动员[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2, 18(4): 82-84.
- [39] 袁贵仁. 价值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361.
- [40] 芮明杰. 管理学: 现代的观点[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9.
- [41] 刘一民, 王清玉, 孙庆祝. 论集体项目运动队综合制胜力[J]. 中国体育科技, 1999, 35(2): 21.
- [42] 石岩. 我国备战与征战奥运会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J]. 体育与科学, 2004, 25(1): 42-60.
- [43] JENKINS J C.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J]. Annual Rev Socio, 1983, (9): 527-553.
- [44] 邵斌, 黄玉斌. 对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实施激励的原则及方法

-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3, 27(4): 37-41.
- [45] 熊秀华. 运动员心理激励的依据、途径与机制[J]. 中国体育教练员, 2003, (2): 24-25.
- [46] 蒋志学.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我国体育科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7, 41(1): 1-5.
- [47] 袁伟民. 加强创新, 深化改革, 把体育科技工作全面推向新世纪——袁伟民副局长在 1999 年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J]. 中国体育科技, 2000, 36(1): 1-4.
- [48] 陈俊钦, 黄汉升, 许红峰, 等. 新中国体育科技 50 年回顾与前瞻[J]. 体育科学, 2000, 20(5): 3-7.
- [49] 马铁. 为实现奥运战略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J]. 体育科研, 2001, 22(2): 29-31.
- [50] 袁伟民. 袁伟民同志在 2001 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N]. 2001 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文集[C]. 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 2001.
- [51] 袁伟民.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 27 届奥运会的基本经验[J]. 体育科学, 2001, 21(2): 1-4.
- [52] 史康成.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科技工作的思路措施以及对对中国奥委会兴奋剂控制规则征求意见稿[J]. 体育科学, 2005, 25(9): 15-19.
- [53] 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 新世纪体育改革发展之讨论[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0.
- [54] 司虎克, 蔡犁, 陈培基, 等.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与科技进步关系的研究[J]. 体育科学, 1999, 19(4): 37-40.
- [55] 林南, 张磊译.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31.
- [56] 罗伯特·塔克. 政治领导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57] 俞继英, 宋全征, 杨再准, 等.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激励的原则与模式[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9(5): 46-51.
- [58] 张三梅. 我国奥运奖励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6, 26(4): 9-12.
-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5.
- [60] 吉雷·梅楚尼奇. 组织学习、绩效与变革: 战略人力资源开发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61] H D STOLOVITCH, E J KFEPS. Handbook of human performance technology: impro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orldwid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9.

· 学会信息 ·

第 7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暨体育科研专题研讨会在福建举行

【本刊讯】为加强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者、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通过中国体育学术期刊这一平台, 促进我国体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携手打造中国体育科技精品期刊, 2007 年 8 月 15 至 17 日,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在福建武夷山举办了第 7 次全国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研讨会暨体育科研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的 40 多家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及全国高校体育院系和体育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野博士到会并祝贺会议成功举行;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专门向本次会议发来了贺词; 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的领导也通过其他方式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关注。大会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组长李晓宪主持,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副组长、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冉强辉编审致开幕词。

田野在讲话中肯定了近年来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取得的进步与发展, 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期刊出版的装帧印刷质量和版面栏目设计等方面, 学术质量也有所提高, 2006 年, 体育界的一篇科研论文被选为中国科协 2006 年度中国优秀科技论文, 同时, 近年来,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科技部等部门加大了对体育科研的投入, 体育科技工作者充分抓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 深入开展体育科学研究, 体育科研水平明显提高。在此情况下, 本次会议从科研选题、课题申报、编辑部与作者读者近距离互动等角度达到编辑部为作者服务、作者为读者服务的目的, 有利于体育科研出精品, 也有利于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本次会议的议程分为专题报告与大会报告两个部分。在专题报告部分, 首先, 田野博士做了关于“中国体育科学学科发展”的报告。该报告也是 2006—2007 年中国科协的重点资助项目。报告从体育科学的研究热点与高水平成果、国内外体育科学研究现状、中国体育科学研究展望等几个方面深入浅出的概括总结; 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办公室主任江崇民博士做了关于“中国国民体质研究的进程及热点问题”的报告。他从体质的概念、我国国民体质研究的发展历程、国民体质监测体系、正在实施的标准与体质监测的问题、学生体质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体制研究中的误区、中国国民体质研究展望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雨普做了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申报建议”的报告, 他从近年来课题基本情况、评审程序、选题、项目类别以及研究条件、预期成果、经费等方面做了介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吴健博士做了关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 报告从课题申报渠道、“六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情况、课题的管理、“十一五”规划课题研究领域的分析等角度做了阐述;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技书刊部主任李晓宪做了关于“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与发展”的报告, 他从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 中文体育核心期刊的特征、作用及基本功能、如何撰写科研论文以及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等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王子朴博士做“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的报告。

此外, 本次会议还以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为单位, 分别与到会的代表就各刊的办刊特色、稿件运作流程及各种作者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面对面探讨, 充分取得了编者、作者、读者服务的良好效果。

本次会议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黄汉升教授以及北京普康科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编辑学组)